

石峁人群族属探索*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关键词】石峁遗址;老虎山文化;黄帝;北狄

【摘要】文章认为石峁人群属于传说中的黄帝后裔北狄先民,理由有四:其一,通过老虎山文化的南下与“稷放丹朱”事件的对应,可证老虎山文化游盪类型可能属于后稷族系遗存,则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理当属于和后稷族系同源人群的文化;其二,通过石峁类型末期较多陶寺晚期文化因素的出现,可证石峁类型可能属于姬周先祖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之“戎狄”文化;其三,老虎山文化的重要源头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被推测为黄帝部族的遗存,文献中后稷族系和“北狄”等部分“戎狄”属于黄帝后裔,说明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和游盪类型一样,可能都属于黄帝后裔的遗存;其四,石峁类型的后继文化也当属于戎狄文化。

DOI:10.13635/j.cnki.wwcq.2019.04.002

陕西神木石峁古城是近年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1,2],人们在惊叹其巨大体量、宏伟建筑、精美玉器、诡谲浮雕的同时,不免会联想到石峁人群的族属问题。完成如此壮举的“石峁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在古史传说中有没有他们的位置?我曾发短文简略表达过“石峁人”或属北狄先民的观点^[3],本文试做进一步的论述。

一、石峁遗存属于老虎山文化

首先应当明确石峁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归属。

石峁遗址所出典型陶器,主要有双鬲鬲、

敛口甗、大口尊等,和陕北其他区域以及内蒙古中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西北部龙山时代遗存的主体陶器基本一致,我们曾将这类狭义“北方地区”的龙山遗存统称为老虎山文化^[4,5]。老虎山文化有不少地方性差别,可以分为若干地方类型,或者若干“亚文化”——田广金最早提出“老虎山文化”的名称,但仅用以指称内蒙古中南部龙山遗存^[6];魏坚称鄂尔多斯地区龙山遗存为永兴店文化^[7];张忠培称晋中龙山遗存为杏花文化^[8];石峁所代表的陕北北部遗存有一定特色,如三足瓮出现最早且发达,可称之为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当然称石峁文化也未尝不可^[9,10]。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号:18ZDA172)阶段性成果之一

发掘者将石峁古城遗存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流行宽裆的斝式鬲,晚期变为尖角裆的典型鬲,新出三足瓮、盃等陶器,绝对年代分别在大约公元前2300~前2100年、公元前2100~前1800年,大致相当于我们划分的老虎山文化前期晚段和后期。

和中原等地相比,前期阶段的老虎山文化还是比较“落后”的,虽因战争频繁而常见石墙山城,家族组织也已凸显,但缺乏大城、大墓和贵重物品,社会分工、贫富分化不明显,我们曾称之为社会发展的“北方模式”,与分化严重的“东方模式”和朴实执中的“中原模式”有一定区别^[11]。至于石峁石城的超大规模,玉器、兽面纹装饰等的出现,当为其与陶寺文化传统碰撞交流的产物,并非北方地区的固有因素。

二、老虎山文化南下临汾与“稷放丹朱”

约公元前2100年左右,中国东亚季风气候区出现“干冷事件”,北方长城沿线农业发展条件变得异常恶劣,曾经繁荣一时的岱海地区老虎山文化聚落群骤然消失^[12],双鬲鬲、细石器镞和卜骨等北方文化因素大范围南下,一直流播到黄河中下游地区,表明在龙山前后期之交,老虎山文化有过明显的向南移动和影响态势^[13]。这当中以老虎山文化南下临汾盆地最具戏剧性。

龙山前期,在晋南临汾盆地突然出现发达的陶寺文化,陶寺都城近三百万平方米的宏大体量、豪华大墓、精美玉器^[14、15],都令人印象深刻,王文清^[16]、邹衡^[17]等提出陶寺文化为尧所属的陶唐氏遗存。而陶寺文化的势

力范围可能已经南达黄河沿岸,西越黄河进入延安地区,分别以芮城清凉寺墓地^[18]和延安芦山峁遗址^[19]为代表,这两处遗址也都以出土大量精美玉器而闻名。我们曾提出,陶寺文化的出现,当为东方地区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人群西迁所致,可能对应传说中的“唐伐西夏”事件^①。

但到龙山前后期之交,风云突变,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出现大量类似晋中的双鬲陶鬲,陶寺文化也因此而变为陶寺晚期文化,说明北方地区和晋西南人群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战争。后来的考古工作发现陶寺遗址还存在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疯狂毁墓等现象,临汾下靳墓地、芮城清凉寺墓地的大中型墓葬也尽数被毁^[20、21],由此可见老虎山文化人群“残暴”的一面,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石峁所出以青年女性头骨为主的多个头骨坑是否就是杀害战俘的结果。但陶寺晚期文化之初的双鬲鬲和晋中游邀类型者更接近,更应该是晋中人群南下摧毁陶寺古城,而不一定是石峁人群。

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的南下临汾和陶寺文化的衰亡,可能对应《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稷放丹朱”事件(《山海经·海内南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后稷放帝朱于丹水”)。稷或后稷,即传说中周人的始祖,钱穆等认为后稷与其母有邠氏姜嫄的居地就在晋西南地区^[22]。丹朱传说中为尧子,其始居地应该就在“尧都平阳”(《汉书·地理志上》河东郡平阳条下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23]1551}《汉书·地理志下》中山国唐条下有“尧山在南”,应劭曰:“故尧国也。”^{[23]1632})——晋南临汾盆

①“唐伐西夏”最早见于《逸周书·史记解》:“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又《左传·昭公元年》:“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次序也是先有“大夏”,后有“唐人”。我曾提出“唐伐西夏”的结局,就是陶唐氏从豫东鲁西南迁居晋西南,对应考古学上临汾盆地陶寺文化的形成和庙底沟二期类型的消亡。参见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4期,第119—123页。

地,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当和尧一样,为陶寺文化。由此推测,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有可能是最早的后稷族系文化或者最早的姬周文化,陶寺晚期文化是稍晚的姬周文化^[24]。体质人类学分析结果也表明,碾子坡等周人组与陶寺、游邀等山西古代居民组有最为密切的关系^[25]。邹衡早年曾将先周文化的渊源追溯到所谓光社文化,也就是晋中地区晚于游邀类型的文化,确有先见之明^[26]。这样一来,同属老虎山文化的石峁类型,即便不属于后稷族系,也当与其关系极为密切,属于一个大的人群集团。

三、陶寺晚期文化的西北向迁移与 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

陶寺晚期文化,也即稍晚的后稷族系文化,在晋西南地区延续了约300年,到大约距今3800年之后,随着二里头文化势力从洛阳盆地进入,才彻底告一段落。令人奇怪的是,陶寺晚期文化典型的大肥袋足鬲、深腹簋、三足杯、单耳杯、鬲形器、折肩罐等陶器在晋南消失,却突然出现于陕北北部石峁类型末期的神木新华^[27]、石峁遗址,以及鄂尔多斯地区的朱开沟早期遗存等当中^[28]。

《国语·周语》记载:“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韦昭注:“衰,谓启子太康废稷之官,不复务农。《夏书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窋,匿也。尧封弃于邠,至不窋失官,去夏而迁于邠,邠西接戎,北近狄也。”韦昭以“太康失国”解释“夏之衰”,可谓确当。按照夏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的方案^[29],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就应当是早期夏文化,“太康失国”就应该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之初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偏晚阶段,相当于石峁类型晚期。而陶寺晚期文化因素恰好于此时进入陕北—鄂尔

多斯地区,岂不正对应姬周先人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的事件^[24]?

然则又如何理解“戎狄之间”?韦昭显然是从戎狄有别的角度,认为戎在西方,狄在北方。但《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前面说“可以威民而惧戎”,后面讲“狄之广莫,于晋为都”,将戎和狄当作了同一个对象。按照王玉哲的梳理,西周以前北方已有狄(即易)的名称,春秋战国时期所谓戎、狄可以互称,战国末期才如《大戴礼记·明堂》所说出现“南蛮、东夷、北狄、西戎”这样整齐划一的说法^[30]。实际上我们目前无法确证“自窜于戎狄之间”到底属于哪种情况,但说石峁类型可能属于笼统的“戎狄”之文化,或者“戎”与“狄”之某一支的文化,应该大致不差。

四、石峁类型具体可能属于 黄帝族系后裔北狄的文化

龙山时代的老虎山文化虽与晋南文化面貌各异,分庭抗礼,但其渊源却都是仰韶文化,都有着晋西南、豫西和关中东部的庙底沟类型的深厚基因^[31]。我们曾撰文论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能是黄帝族系的文化^[32,33],那么,老虎山文化就应当是黄帝族系后裔的文化。上述老虎山文化游邀类型可能对应后稷族系。后稷姬姓,而据《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据《国语·晋语》,黄帝诸“子”中第一姓即为姬姓。可知黄帝和后稷可能确存在渊源关系。

无独有偶,属于黄帝之后的还有可能姬姓的北狄。《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大荒北经》也说:“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知北狄、白犬、犬戎在传说中也都是黄帝后裔,或者说他

们本来就是同一群人的不同称呼,白犬或即白狄。《世本》又说:“鲜虞,姬姓,白狄也。”推测白狄可能也是姬姓,与后稷同宗黄帝。这就是说,石峁类型可能笼统属于“戎狄”文化,具体属于黄帝后裔北狄的文化。

当然戎也有姬姓宗黄帝者。《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伐骊戎”,杜预注:“骊戎……其君姬姓。”又“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所以也不排除石峁类型与姬姓戎有关的可能性。

五、石峁类型的后继文化也当属于戎狄文化

老虎山文化的继承者,是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等地的朱开沟文化^[34,35],再之后的晚商时期,则发展为陕北的李家崖文化^[36]和鄂尔多斯地区的西岔文化等^[37],陶鬲、甗、三足瓮延续,石城衰落,新出刀、剑等各种武器工具类和装饰品类“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半农半牧文化。

李伯谦认为,晋陕高原的石楼—绥德类型青铜文化的族属,当为甲骨文中记载的和武丁长期争战的舌方^[38],而石楼—绥德类型青铜器群与李家崖文化、西岔文化等在分布地域和时代上有所重合,很可能就是一回事。吕智荣则认为,李家崖文化可能是《周易》所说“高宗伐鬼方”的鬼方遗存^[39]。而无论是舌方还是鬼方,应当都属于戎狄之属。据《古本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此“西落鬼戎”应即“鬼方”,属于狄(翟)人。而诸狄中的赤狄,被认为属于隗氏,也当与鬼方有关。可证鬼方很可能属于狄之一支。由此上溯,也可证“石峁人”可能属于戎狄,更可能属于狄人。

有以上论述,就可得出石峁人属于传说中的黄帝后裔北狄先民的推论。也可知狄人至少四千多年以来就生活在长城沿线,和华夏同源而交流,同根而相煎,《墨子·节葬下》

“尧北教乎八狄”的说法并非全属妄言。石峁所出玉器、石浮雕上的人面形象,着意强调突出的颧骨,说明狄人和华夏人具有类似的形貌特征,而绝非西方人形象。狄人曾经达到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文明高度,为多元一体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沈长云早先主要通过对历史传说的钩沉,提出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的观点^[40]。但黄帝和黄帝后裔毕竟并不是一回事。黄帝不会晚到尧舜禹时代,不会晚到龙山时代。吕智荣虽然和我同样提出石峁古城可能为古代狄族先民之都邑的观点,但他将石峁遗存归之于“黄帝的后裔”“共工氏”,则是我不能同意的,因为共工氏在龙山时代大约是以豫北辉县一带为中心的,而且一般认为其先人可能为姜姓炎帝而非姬姓黄帝^[41,42]。至于张怀通提出的“石峁古城是上古西夏的都邑”的观点^[43],与我所论“西夏”年代相差甚远,我认为难以成立。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J].考古,2013(7):15—24.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石峁遗址管理处.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J].考古,2017(7):46—56.

[3]韩建业.“石峁人”或属北狄先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12-27(8).

[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5]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6]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J].考古学报,1997(2):121—146.

[7]魏坚.试论永兴店文化[J].文物,2000(9):64—68.

[8]张忠培.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鬲手陶鬲[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4):6—50.

[9]张宏彦,孙周勇.石峁遗存试析[J].考古与文物,2002(1):56—61.

- [10] 巩启明. 新世纪陕西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 下[J]. 文博, 2018(5): 31—50.
- [11] 韩建业. 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M]//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古代文明: 第2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84—96.
- [12] 韩建业. 距今5000年和4000年气候事件对中国北方地区文化的影响[M]//周昆叔, 莫多闻, 佟佩华, 等. 环境考古研究: 第三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59—163.
- [13] 韩建业. 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J]. 中原文物, 2007(1): 17—23.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临汾市文物局.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2005(3): 307—346.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 襄汾陶寺: 1978—1985年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
- [16] 王文清. 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M]//田昌五. 华夏文明: 第一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06—123.
- [17] 邹衡. 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M]//田昌五. 华夏文明: 第一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162—179.
- [1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 芮城县旅游文物局. 清凉寺史前墓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6.
- [1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延安安市文物研究所. 陕西延安芦山岗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N]. 中国文物报, 2018-11-16(7).
- [20] 韩建业. 葬玉、殉葬与毁墓: 读《清凉寺史前墓地》[N]. 中国文物报, 2017-06-13(8).
- [21] 高江涛. 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三代考古: 七.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345—354.
- [22] 钱穆. 周初地理考[J]. 燕京学报, 1931(10): 1955—2008.
- [23] 班固. 汉书: 地理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4] 韩建业. 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J]. 考古与文物, 2002(增刊): 212—218.
- [25] 王明辉. 周人体质特征分析[G]//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909—924.
- [26] 邹衡. 论先周文化[M]//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297—356.
- [2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神木新华[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28] 韩建业. 内蒙古朱开沟遗址有关问题的分析[J]. 考古, 2005(3): 55—64.
- [29] 韩建业. 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J]. 中国历史文物, 2009(1): 37—47.
- [30] 王玉哲. 中华民族早期源流[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0: 34—40.
- [31] 韩建业. 龙山时代的中原和北方: 文明化进程比较[J]. 中原文化研究, 2017(4): 81—84.
- [32] 黄怀信. 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 炎、黄部族[J]. 考古与文物, 1997(4): 33—37.
- [33] 韩建业. 涿鹿之战探索[J]. 中原文物, 2002(4): 20—27.
- [34]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鄂尔多斯博物馆. 朱开沟: 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 [35] 田广金, 韩建业. 朱开沟文化研究[M]//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考古学研究: 五: 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227—259.
- [3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李家崖[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 [3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清水河县文物管理所. 清水河县西岔遗址发掘简报[M]//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1: 60—78.
- [38] 李伯谦. 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2): 15—29.
- [39] 吕智荣. 鬼方文化及相关问题初探[J]. 文博, 1990(1): 32—37.
- [40] 沈长云. 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N]. 光明日报, 2013-03-25(15).
- [41]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 增订本.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47—48, 136—139.
- [42] 邹衡. 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M]//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253—294.
- [43] 张怀通. 谁的石峁?: 石峁古城系上古西夏都邑[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03-18(15).

〔责任编辑: 成彩虹〕